

德藏吐鲁番文献《龙龕手鑑·禾部》残页小考

秦梓林

西胁常记先生《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文献》著录并定名吐峪沟出土 Ch 1874 号刻本“《龙龕手鑑》卷一”^①。核对图版(见图一),此系《龙龕手鑑·禾部》刻本残页,相当于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《龙龕手鑑》卷一第四十九页背面的右上部分(见图二)。残页高 12.6 厘米,宽 13.1 厘米,天头 2.5 厘米,版心题“龙一”,存六残行^②,存完整标目字十二个,注释双行小字,字体为欧体。



图一

Ch 1874 号《龙龕手鑑·禾部》刻本残页



图二

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《龙龕手鑑·禾部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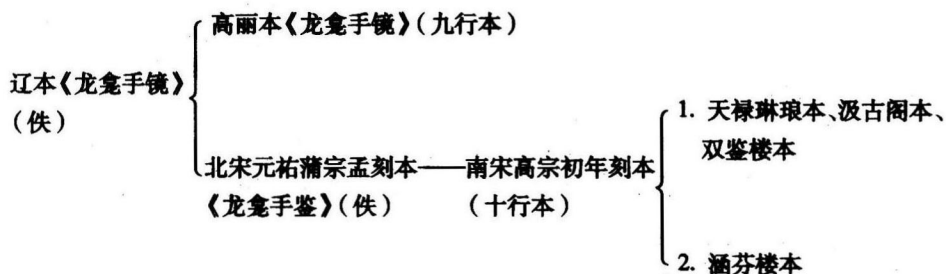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《龙龕》版本的基本情况

《龙龕》一书现存九行本、十行本两个系统的本子(参见下表及后文):

九行本系统题名《龙龕手镜》,仅存高丽本(缺卷二),此本被认为最接近

①西胁常记:《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文献》(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),费朗兹·斯坦纳出版社,2001年,第49页。

②荣新江主编《吐鲁番文书总目(欧美收藏卷)》标为“7行”(武汉大学出版社,2007年,第154页),盖误将版心算作一行。



辽本面貌，刻于1236—1251年之间^①。有中华书局配补影印本^②，底本系京城帝国大学1929年影印本。此底本将朝鲜金刚山楡岾寺藏第一卷及京城崔南善藏第三、四卷合刊影印^③。

十行本系统题名《龙龕手鑑》，为北宋元祐元年(1086)蒲宗孟于杭州刊刻时^④避讳改题，现存四种南宋本：

1. 天禄琳琅本，四卷全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书影见《故宫博物院藏宋本图录》^⑤。

2. 汲古阁本，缺卷二，毛晋影宋钞补。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有董氏涵芬楼1925年珂罗版影印本、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本^⑥。

3. 双鉴楼本，缺卷二。《续古逸丛书》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据此本并配补涵芬楼本，加以影印。

4. 涵芬楼本，存卷二。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^⑦。

据陈飞龙先生研究，双鉴楼本与天禄琳琅本在版式、行款、字体、刻工方面悉同^⑧。陈氏又云：“毛氏子晋藏本与续古逸丛书本面目全同。”^⑨笔者比较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本与《四部丛刊》本(双鉴楼本部分)后，赞同这一观点。因此，汲古阁本、天禄琳琅本、双鉴楼本实系同版。据书中讳字和刻工，此版当为南宋高宗初年浙本^⑩。

张元济先生指出：“(双鉴楼本)平、去、入二卷(引者按：因宋本去、入二

①陈飞龙：《龙龕手鑑研究》，文史哲出版社，1974年，第44页。

②释行均：《龙龕手鏡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
③《龙龕手鑑解说》，杉本つとむ编《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》一期别卷二，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，1975年，第335页。

④王国维：《两浙古刊本考》，《王国维遗书》第九册，上海古籍书店，1983年，第12页。

⑤吴哲夫编：《故宫博物院藏宋本图录》，台北故宫博物院，1977年，第40页。

⑥释行均：《龙龕手鑑》，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本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3年。

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：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经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436页。

⑧陈飞龙：《龙龕手鑑研究》，第4页。

⑨陈飞龙：《龙龕手鑑研究》，第17页。

⑩陈飞龙：《龙龕手鑑研究》，第9页。

卷版心题作“龙三”，故张先生云“二卷”），则刻工仅有五人，然均非（涵芬楼本）卷二所有。版口阔狭亦不同，笔意既殊，铸法并异。”^①张元济先生定涵芬楼本为北宋本，误。赵万里先生据刻工定为“南宋初年杭州地区重刻蒲宗孟本”（《中国版本图录》），极是。

二、德藏本残页与南宋本、高丽本的比较

德藏本残页，属于十行本系统，但有别于现存的南宋诸本（本文选取《四部丛刊续编》影印双鉴楼本、涵芬楼本，以下简称“丛刊本”），刊刻更早。其间异同，请见下表：

	德藏本	高丽本	丛刊本	异 同
版心	横向分隔线	无	无	德藏本“卷一”下有分隔线
	破损不明	单鱼尾	单鱼尾	丛刊本、高丽本有鱼尾
	破损不明	无	小七六三	丛刊本鱼尾上有字数
行款	存六残行	半页九行	半页十行	德藏本字序同于丛刊本
文字	控	控	控	德藏本部件“工”笔画稍异
	緇	緇	緇	丛刊本误
	容	容	容	德藏本二点笔势异，不同于高丽本、丛刊本
	反	反	反	丛刊本偏旁“厂”出头
	穰	穰	穰	德藏本部件“辰”讹作“版”
	穉	穉	穉	高丽本部件皆作“小”，丛刊本皆作“屮”，德藏本上作“屮”，下作“小”。其中丛刊本误；德藏本字形同于朝鲜增字本
	或	或	或	高丽本末笔点在起笔横下
	士	士	士	高丽本讹，德藏本、丛刊本皆作“士”
	穰	穰	穰	丛刊本作“木”旁，误。德藏本部件“襄”缺左下方撇。高丽本不误
	穉	穉	穉	德藏本、高丽本同，为俗字；德藏本作正体
	俗	俗	俗	德藏本部件“八”笔势异，向内倾，不同于高丽本、丛刊本

①张元济：《涉园题跋集录》，古典文学出版社，1957年，第31页。

(续表)

	德藏本	高丽本	丛刊本	异 同
文字	穠	穠	穠	高丽本部件作“方”，德藏本部件作“𠂔”，丛刊本部件作“𠂔”
	𣎵	𣎵	𣎵	丛刊本误
	𣎵 (彼)	𣎵	𣎵	德藏本末笔呈挑势
	穀	穀	穀	德藏本末笔呈挑势

从上表可见,在版式、行款、字体方面,德藏本与丛刊本非常接近,故二书当同出一源。但德藏本版心所题“龙一”下,刻有横向的版心分隔线^①,此大异于丛刊本(双鉴楼本部分)。我们认为,德藏本此页的版心很可能原本没有单鱼尾(说详下文)。在字形以及点划方面,德藏本也与丛刊本存在不少差异,如德藏本“容”“俗”二字的“八”形笔势向内倾,呈“ノ”形;“彼”“穀”末笔捺呈挑势。此外,德藏本上单边与正文之间的空白处明显比丛刊本的要多(比较图一与图二右起第三行)。因此,德藏本与南宋诸本决非同一时期的刻本,而是第三种版本。

三、德藏本残页的版本价值

《龙龕》九行本与十行本系统可能来源于两种不同的辽本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十五记载:

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,凡一十六万字,分四卷,号《龙龕手镜》。燕僧智光为之序,甚有词辩。契丹重熙二年集。契丹书禁甚严,传入中国者法皆死。熙宁中,有人自虏中得之,入傅钦之家,蒲传正帅浙西,取以镂版。其序末旧云:“重熙二年五月序。”蒲公削去之。观其字音韵次序,皆有理法,后世殆不以其为燕人也。^②

中华书局《龙龕手镜》影印本《出版说明》把“有人自虏中得之”的“虏”解释为“俘虏”^③,不确。“虏”是宋人对北方外族的蔑称,这里指辽国,如《宋史·曹利用传》:“景德元年……(曹)利用再使契丹。……天禧二年……利用

①此处细节承匿名专家指出。笔者按,由于此版心分隔线靠近“龙一”的“一”,乍看去颇似“二”字(“二”)。细审图版,德藏本小注中的“二”字(共出现两次),分别刻作“二”“二”,末笔皆有锋棱,而那条分隔线则明显与此不同。且《禾部》本属《龙龕》卷一,亦可证德藏本“龙一”下确为版心分隔线。

②沈括著,胡道静校证:《梦溪笔谈校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,第513页。

③释行均:《龙龕手镜》,第2页。

曰:‘以片文遇主,臣不如迪;捐躯以入不测之虏,迪不逮臣也。’”^①。傅钦之、沈括、蒲宗孟俱曾出使辽国^②,且沈、蒲二人出使时间又同在熙宁中,故《梦溪笔谈》所提“自虏(辽国)”得书之“有人”实耐人寻味。

由文中“契丹重熙二年集”“其序末旧云:‘重熙二年五月序’”^③等语推测,蒲刻北宋浙本很可能袭自一种题有重熙二年(1033)序的辽刻本^④,但此序“蒲公削去之”,只保留了统和十五年(997)智光序。九行本系统的高丽本书前亦无重熙二年序,但这并不足以支持宋晁公武提出的沈括“妄记”的看法^⑤(沈括明言“观其字音韵次序,皆有理法”,足证其亲见《龙龕》;考察沈、蒲二人关系,可知其说当有根据)。笔者认为,高丽本无重熙二年序,说明其所用之底本当早于蒲刻之底本,理由有二:

1. 1974年发现的山西应县木塔藏辽代刻本,其中题记最早的经卷为统和八年(990)“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”的“燕台大悯忠寺沙门诠明改定”《上生经疏科文》一卷^⑥。而于统和十五年(997)为《龙龕》作序的智光正是“燕台大悯忠寺沙门”。这恐怕并非偶然的巧合。《龙龕手镜》很可能成书不久,便于统和年间在辽国的出版中心燕京刊刻。高丽本大概源出此本,因此高丽本虽然晚出,但更接近原貌。

2. 吕澂先生《契丹大藏经考略》云:“契丹大藏经始雕于重熙初年^⑦,其后续有增修,迄咸雍时乃完成五百七十九帙。契丹以圣宗太平元年(1021)得宋刻之大藏之赠送,继即仿刻《大般若》等经版。华严寺碑谓兴宗重熙间编纂一切经目,当是进而开雕全藏之始。契丹僧觉苑《大日经义释演密钞》卷一云:‘洎我大辽兴宗御宇,志宏藏教,欲及遐迩,敕尽雕镂。’与此吻合,可为佐证。”^⑧蒲刻本所

①脱脱:《宋史》卷二九〇,中华书局,1976年,第9706、9707页。

②王鼎厚:《辽代佛学字书〈龙龕手镜〉考略》,《社会科学辑刊》2001年第6期,第103页。

③所云“集”当指《龙龕》卷端“释行均字广济集”。《龙龕》实成书于辽统和十五年(997),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一已辨其误:“今本乃云统和,非重熙,岂存中不见旧题,妄记之邪?”但晁公武提出的沈括“妄记”“重熙二年序”的看法,笔者不赞同。

④吕澂先生《契丹大藏经考略》小注:“《龙龕手镜》于宋熙宁中流入内地,据《梦溪笔谈》,应有重熙二年序文。”(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》第三卷,齐鲁书社,1991年,第1440页)

⑤晁公武: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一。

⑥山西省文物局编《应县木塔辽代秘藏》,文物出版社,1991年,第14、288页。

⑦《应县木塔辽代秘藏》前言云:“(木塔秘藏)统和廿一年沙门道撰复(引者按:疑当为“覆”)刻的《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女》的发现,确证辽藏始雕于圣宗统和时期。”按,核对原卷图版,题记明言“道撰遭逢圣代,幸偶遗风,敢雕无上之经,溥示有缘之众”,属个人刻经行为,还不足以证明统和年间辽国已经开始系统刊刻大藏经,因此笔者仍取吕澂先生的观点。亦有学者据版式指出,《称赞大乘功德经》不属于《契丹藏》,“而是根据某种写本藏经上版的单经”(李际宁:《佛经版本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91页)。

⑧吕澂: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》第三卷,第1433、1434页。

据之底本,前有“重熙二年五月序”,此辽本《龙龕》盖为配合刊刻、阅读契丹藏而印的重刻本(辽本《龙龕》本身不入藏,观据开宝藏、契丹藏刊刻的高丽藏中亦不收《龙龕手镜》可以推知)。蒲宗孟之所以要把“重熙二年五月序”“削去之”,也许由于他使辽时见过仅有智光序的早期辽本《龙龕手镜》,但最大的可能是“重熙二年五月序”中有对辽兴宗开雕藏经、弘扬佛法的赞美之词,在宋重刻,牵涉政治,不得不删。

德藏本残页填补了《龙龕》十行本系统演变的重要环节。西胁常记先生鉴定此残页为宋版^①。笔者赞同这一观点,并进一步指出,德藏本残页当为北宋浙本。这里说明以下三点理由:

1. 在版式方面,德藏本残页与南宋诸本非常接近,所以把此残页看作宋浙本当属合理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德藏本版心所题“龙一”下刻有横向的版心分隔线,此不同于双鉴楼本。但这种版心样式在涵芬楼本(存卷二)中却大量存在,此本有鱼尾与无鱼尾的页面间杂,凡是无鱼尾的页面,均在版心所题“龙二”与所记页数的上下方,分别刻有两条横向的分隔线,如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页等(共31页),占涵芬楼本总页数(共69页)的45%。由此不难推知,德藏本残页亦当无鱼尾^②,版心所题“龙一”也是通过分隔线与版心界组成的方框予以醒目地标识。可见,德藏本与涵芬楼本的关系更为密切,其为宋浙本无疑。

2. 德藏本残页与南宋诸本在点划方面虽有区别,但字体极类,同为刊刻极精的欧体,有明显的浙本风格。取《龙龕》德藏本、南宋本书影与《应县木塔辽代秘藏》中收录的辽本书影对比,正如黄永年先生指出的:“这些辽刻本的字体均作欧体而较南宋浙本朴拙。”^③因此,从字体方面可以推断,德藏本残页不会是辽本,而应是宋浙本。

3. 南宋本的一些错误明显导源于德藏本。如𪛗(高丽本)→𪛗(德藏本)→𪛗(丛刊本);又如𪛗(高丽本)→𪛗(德藏本)→𪛗(丛刊本),德藏本把部件“方”讹变为“𠂔”,丛刊本讹上加讹,变为“𠂔”。丛刊本《足部》有“𪛗”字,所从声旁正与德藏本同。以上讹误说明,南宋本当刻于德藏本之后,而现存的南宋本都刻于高宗初年,因此,德藏本当为北宋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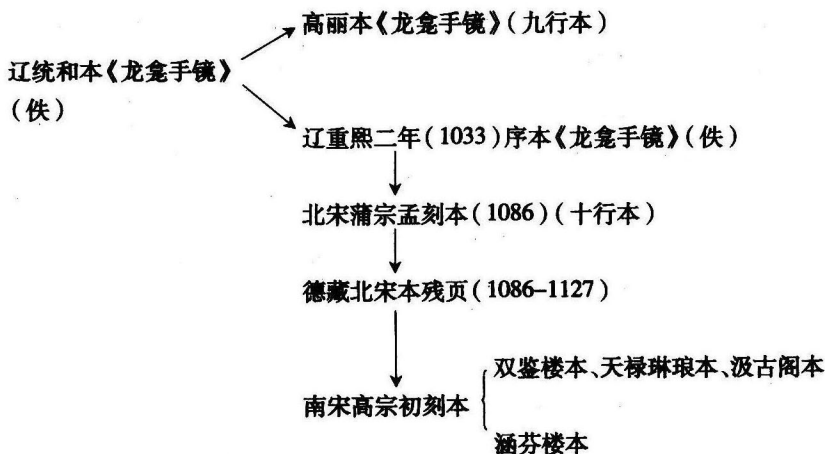
德藏本残页是否为北宋元祐元年(1086)蒲宗孟原刻,不得而知,但其早于现在所存的南宋诸本,应属无疑。我们期待学术界对欧美藏吐鲁番文献中的刻本能有进一步的整理、研究,以期能有其他《龙龕手镜》残页的新发现。

笔者试对本文第一节中的版本传承表,加以补充调整:

①西胁常记:《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文献》,第49页。

②不排除德藏本原书其他页面有鱼尾的可能性。

③黄永年:《古籍版本学》,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5年,第91页。



四、德藏本残页的校勘价值

德藏本《龙龕》刊刻较早,虽仅片纸残页,亦不无优点,有较高的校勘价值。

(一)德藏本优于丛刊本处:

丛刊本误处,如“稻”误为“稱”;“黍”误为“黍”;“穰”当为“禾”旁,以上德藏本皆不误。丛刊本俗体“穰”误为“穰”,与标目字所列正体重;德藏本作“穰”。

(二)德藏本优于高丽本处:

1. 高丽本:穰,正,土于反。按:“土”,误。德藏本作“土”,不误,《广韵·虞韵》:“穰,仕于切。”

2. 高丽本:音支,穗也。按:“穗”,德藏本作“穰”。高丽本作“穗”虽不误,然《龙龕》有“行文不避俗字例”^①,而“穗”据《龙龕·禾部》为俗字,此俗字敦煌写卷中经见^②,斯 388 号敦煌写卷《正名要录》把“穗”列为“今而要者”,可见其相承已久,很可能更接近辽本的原貌。

(三)与朝鲜增字本比较:

德藏本标目字“穰”(高丽本作“穰”),不见于其他中土字书,应系传刻中讹变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此字形见于嘉靖四十二年朝鲜增字本《龙龕手鑑》所载^③,并由增字本题名作《龙龕手鑑》,而非如高丽本作《龙龕手鏡》,都说明增字本很可能并非袭自高丽本而是另有所承。今推测可能源自于一种接近德

①张涌泉:《〈龙龕手鏡〉读法示例》,《敦煌俗字研究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,1996年,第353-354页。

②黄征:《敦煌俗字典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5年,第391页。

③《龙龕手鑑》,杉本つとむ编《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》一期别卷二,第100页。

藏本的本子。

当然，辗转递刻，不能无误，德藏本残页也存在误字，如“穢”（当作“穢”）、“穢”（当作“穢”）之类。

五、小结

德藏本《龙龕手鑑·禾部》残页属于十行本系统，据版式、行款、字体判断，应为北宋浙本，与北宋元祐蒲刻本存在密切关系，早于现存南宋诸本。

此残页出土于吐峪沟。宋浙本图书何以流至西域？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在德藏吐鲁番文献中还有一些字书（如《大广益会玉篇》）、史书（《新唐书》）的刻本残页，《龙龕手鑑·禾部》残页的存在并非偶然现象。在内蒙古黑水城文献中也有南宋刻本残页的发现^①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浙本作为一种文化产品，流布之广、传播之远。这也提醒我们，两宋时代的“书籍之路”^②除了有输往朝鲜、日本的东线和输往辽、金的北线、还存在一条通往西夏、吐鲁番（西州回鹘、西辽）的西北线，这对深入研究两宋时期的文化交流史不无裨益。

本文写作过程中，西胁常记教授惠赠有关资料，谨致谢忱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

^①段玉泉：《黑水城文献〈资治通鉴纲目〉残页考辨》，《宁夏大学学报》（社科版）2006年第3期，第68-70页。

^②王勇等著：《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研究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3年。